

第六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舞台

尼克松决定访华的轨迹

美国新总统尼克松的上台和美国的亚洲战略转换，随着美国从越南撤走地面军队和美国采取的对华接近政策，尽管曲折艰难，但确实是在一步步地进行着。东南亚诸国及中国的反应也逐渐趋向明朗化。

曾一度中断的美中会谈重开

投入到越南的总共五十四万美军第一次开始撤退是 1969 年 7 月 8 日。自从 65 年 3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千五百人作为第一批地面战斗部队从岷港登陆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年四个月。美国的越南介入，总算开始了缩小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开始采取接近中国政策的美国政府，69 年 12 月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了新的缓和措施，并在同月 24 日发表了在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的巡逻时间从“常时”缩小到“随时”。次年 70 年 1 月 20 日，长期以来一直中断的美中大使级会谈也在华沙重开。

这些都是尼克松政权所显示的解决越南战争和对华接近的具体布置，暗示着美国并非“历史的俘虏。”有消息说中国也开始注视着美国的动静，如果美国真的从越南、台湾海峡撤走，短时间内，中国将会答应继续美中会谈。

进攻柬埔寨的逆流

但是，在这期间，除了前面讲到的美国对老挝境内加剧轰炸以外，还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逆流现象。那就是 1970 年 4 月 30 日美军及南越政府军发动的“进攻柬埔寨的作战”。

为什么会再现这种局面？在此简单叙述一下其背景。由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在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以前，就对南越军侵犯边境感到不安和恐惧。为了保全领土完整，1958 年 7 月，柬埔寨承认了中国。但此后边境骚乱还是不断，柬埔寨于是在 63 年与南越断绝了外交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柬埔寨没有加盟对抗共产圈的东南亚军事同盟组织（SEATO），而且还在寻求与中国及北越妥协，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的“左倾的中立政策”感到不满。

1965 年，美国开始对北越轰炸，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岷港登陆后，西哈努克亲王开始对美国产生了不信任感，同年 5 月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柬埔寨从此远离美国，防止越南战火烧身。

1970年1月以后，希望与美国及东南亚军事联盟（SEATO）亲近的龙·诺鲁将军企图夺取政权。他乘西哈努克亲王去法国养病之际，在3月18日发起了追放西哈努克亲王的军事政变。很早以前就打算不把驻在柬埔寨边境地带的南越解放战线总司令部（越共）给打烂就不可能完全撤军的美国，这下与龙诺鲁将军勾结，加上南越政府军一起，对柬埔寨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于是，中国以美国侵略柬埔寨为理由，无限期地延期了美中会谈。中国一边加强与印度支那全地区的解放力量（北越、南越解放战线、老挝爱国战线、柬埔寨民族独立派）之间的协作，一边强烈非难“尼克松外交原则”的真意是“企图让亚洲人自相残杀。”

美国继续采取接近中国的政策

尼克松政权为接近中国而作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出现这种曲折而停下来。这集中表现在70年10月。同月13日美国的邻国加拿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此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在同月25日和26日分别会见了与中国有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雅非阿·甘，以及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议长。

两位首脑在“美中接近”中起的重要的桥梁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他们指出，中国战胜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动荡时期，开始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们主张，要让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美国应该耐心地进行文化协作，并一步一步地扩大通商。同时，两位首脑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问题。

这个动静，不久也波及到了北京。雅非阿·甘总统在11月10日访问了北京，并在14日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亲切会谈。在这前后，罗马尼亚的拉多勒斯库副首相曾“秘密”访问过北京，并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总统对华关系改善的意思。中国方面通过这些会谈，也许已经确信尼克松总统是在认真地寻求与中国的对话。

同年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了延安时代以来的美国友人、著名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会见中，谈到了“可以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但这一部分，斯诺在当时的手记中没写进去，考虑到中美关系实际的进展情况，在71年4月26日的美国《生活》杂志和同月27日的《朝日新闻》才予以发表。

东南亚全区域的中立化构想

国际潮流的变化，特别是“美中接近”的趋势对广大的东南亚各国影响很大。这时，作为一种对应政策而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拉萨克首相的提案：“在中美苏三大强国的保障下，实现东南亚全区域的中立化。”

这个构想是拉萨克在当任首相之前的 70 年 9 月初，在非洲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三次非同盟诸国首脑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同月 23 日，他在就任首相后的施政方针演说上，又重新作了强调，并把这种构想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

值得注意的是，拉萨克首相在三大强国中，把最大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保障”上。其背景除了美军从越南撤退、及美国采取接近中国的政策外，前一年的 5 月，那场曾震撼马来西亚全国的马来籍人与中国籍人之间的“人种骚动”的教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拉萨克首相在中立化构想中提议，“与中国及部分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进入令人满意的状态。但在非同盟各国所拥有的独特的地位这种背景下，为实现国际间的协调，不是应该探讨出有效的对策吗？”卢萨卡会议后，拉萨克首相还专程访问了与中国恢复了友好关系的南斯拉夫及虽属苏联圈但与中国关系很好的罗马尼亚。特别还让罗马尼亚首脑试探一下中国会不会接受他的构想。

71 年 1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英联邦首脑会议期间，拉萨克首相还跟刚承认中国不久的加拿大首相朵留多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再次提出了中立化构想，希望加拿大能给予协作，并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

对拉萨克的构想，当初摇头的不少。但又没有比这更好的构想。在亚太组织（ASEAN）（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组成）的首脑之间，逐渐出现了赞同拉萨克构想的动向。

中美“乒乓外交”

71 年 2 月下旬，出现了考验美中关系和东南亚前途的新的问题。这就是由美国空军支持的南越政府军对老挝南部的侵略战争。这使越南的战火扩大到了印度支那全区域，给解放势力方面极大的刺激。

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非常注重这一局势，在同年 3 月 8 日，率领中国的最高军事和外交官员访问了河内，并严重警告“如果有再进一步的侵略行为，中国将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予以支援”。

这一方面是“暗示”美国方面要自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跟以前的“侵略柬埔寨”不同，这次“侵略老挝南部”，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加。中国根据这点判断美国在“道义上”渐渐抽手了。总之，侵略老挝备受挫折，不久就鸣鼓收兵了。

美国政府从那以后，不断提出改善对华关系政策，71 年 3 月 15 日还宣布了令人注目的完全废除限制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措施。这就成为中国方面“乒乓外交”的直接动机。

其舞台就是在名古屋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4 月 7 日，中国队的宋中秘书长宣布了“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的爆炸性的声明。紧接着 AP 通信社，NBC 广播公司的记

者，及摄影记者访问中国也得到了允许。在欢迎美国队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并说：“你们掀开了中美关系历史的新的新的一页。”

基辛格的“肚子疼”

美国方面接受了中国的“乒乓外交”，决定派遣特使去商议尼克松访问中国事宜。肩负这一重任的是国务卿基辛格，他在同年 9 月，在访问亚洲和欧洲的途中，断然履行了这一历史使命。有消息说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肚子疼”，其实他是瞒过随行记者，在 7 月 9 日的中午 1 点去北京访问了。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结果是，7 月 15 日美中双方同时发表了“尼克松决定访问中国”的重大新闻。就这样，中美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此后，基辛格再度访问中国（1971 年 10 月），尼克松访华的正式日程定于美国时间 1972 年 2 月 21 日至 28 日。

“乒乓外交”的出现和尼克松访华的决定，随后中国在 71 年 10 月 25 日以绝对的优势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严峻的冷战体制下，这种使“美中对峙”化雪为春的历史性大转换，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在促使这一地区向着中立化方向进一步发展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亚太组织（ASEAN）的五国外长，在同年 11 月 25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就如何对应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的变化，进行了认真地讨论。

在同月 27 日，发表了把东南亚作为和平、自由、中立地带的划时代的宣言。这个“中立化宣言”，体现了在 70 年秋天公开提出的拉萨克构想，已作为印度支那周边东南亚各国的共同课题而被采纳。

笔者从 70 年 10 月作为东南亚特派员起，到后来回到东京总社国外通讯部以后，一直在神经高度紧张地追踪着这一连串的变化。

田中内阁向日中正常化始动

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基辛格等随行官员一行，在 1972 年 2 月 21 日中午前，到达北京机场，与前来迎接的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紧紧握手。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就在中南海，热烈地欢迎了尼克松一行。这些镜头，通过电视向全世界进行了转播。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历史性会见。

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和影响

朝日新闻在题为“由美中首脑会谈所想起的”的社论中就尼克松访华意义，是这样开头写的。

“这真是一条遥远漫长的道路。这不单单指从华盛顿到北京相隔的空间距离。革命胜利后的北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二十三年的岁月中，一直是隔绝、紧张，有时还带着血腥味。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更觉得历史的严酷和漫长。英国人在 1840 年就发动了威胁中国人的鸦片战争。从那以来，一百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西洋头号强国的总统终于万里迢迢来到了北京进行访问”。这次访问，美中双方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交涉。

在同月 27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达成的协议提出，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上。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同意，如果中台能和解，美国将从台湾撤军。联想到以前美中那种严峻的敌对关系，这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次“美中握手”给蒋介石政权、苏联及越南造成的冲击和不愉快最大。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对此是欢迎的。

日本各界痛感自己晚了一班车。于是对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对华改善抱消极态度的自民党佐藤政权，开始进行批判。

新内阁的诞生和中国的反应

7 月 6 日，历经七年八个月的佐藤内阁总辞职。众议院在当天的全体大会上举行首相提名，自民党的田中角荣当选为新首相。新内阁在第二天 7 号的天皇认证式后，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田中首相就今后的内政和外交，作了如下的讲演。

“在内政方面，要站在长远的立场上，充分利用国土，解决公害、住宅、土地等问题。

在外交方面，要加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努力推进和平外交”。

对此立即有了反应。周恩来总理 9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欢迎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田中内阁的成立时说，“田中首相提出希望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内外表明，中国有意与日本政府就恢复邦交正常化进行认真的交涉。

各新闻媒介马上报道，日本政府可能会根据田中首相谈话的精神，加紧采取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行动。

这样的判断有其理由。与田中首相亲近的亲华促进派，预测新内阁最大的外交课题是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在田中内阁成立之前，就在试探中国并一直在党内做准备工作。其中心人物有古井喜实、田川诚一、藤山爱一郎等人。其中古井从 4 月下旬就开始秘密地与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接触。

超党派推进日中恢复邦交

在日中关系议论日趋骚然的 6 月下旬，我接到内部已定我作为下期北京特派员的消息。

这样，不但是中国方面的动向，日本政界的内情也得先掌握才行。在一马当先的政治部记者的协作下，我得以扩大了自己采访的范围。

随着从佐藤内阁到田中内阁，打开对华关系的局势越来越明显，一直强烈批判自民党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势力，也开始出现协作的兆头。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强烈要求以中国方面主张的“恢复邦交三项原则”为基础，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恢复邦交的三项基本原则是：①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②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③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当废除）。

同时，中国方面也巧妙利用日本政界的变化，发动日本的执政党及在野党，鼓励搞“超党派外交”。

这里，原社会党委员长的佐佐木更三起了很大的作用。佐佐木在7月12日访问了中国，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就田中首相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坚定决心作了说明。对此，周总理问道：“日台条约怎么办？”佐佐木回答道，“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都说了，日中恢复邦交后日台条约就不存在了。”听了这话后，周总理说：“中日恢复邦交越早越好，我们正式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回国后，请你转告给田中首相。”

但是佐佐木并没有就日中联合声明进行会谈。担任此重要使命的是公明党的竹入义胜委员长。竹入于7月25日到达北京，与周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结果，带回了可以说是准备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联合声明的中国方面的第一次草案。回到日本，他立刻就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进行了汇报。据说看完“竹入笔记”后，田中首相松了一口气，说：“竹入君，我明白了。周总理真是通情达理的人啊。”

越后和赞岐的山人

在临去北京赴任前的8月10日，我拜会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主管政治部的一位记者的引见下，我先向田中首相作了赴任前的道别，他对我说，“要辛苦你了，好好干啊。”当我问及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思想准备怎样时，他自信满怀地回答，“对，当然要搞，没问题！”他给我极深的印象是：敢干、果断、有实践力。

但负责外交实务的大平外相会怎样呢？特别是，“复交三原则”的第三条“废除日台条约”，日本方面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处理？我先在外务大臣办公室，然后在世田谷区的他家里两次拜会了大平外相。在大臣办公室时，外相还是显得有些严肃，但到了家里，他就很随意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就日中关系开始了你知我知的一问一答。当话题转到日台条约时，他表情严肃的说，“这个处理一定得慎重。现在正是最后的关键时刻。”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日本在当时（1952年）承认蒋介石总统的国民党政府所缔结的日台条约，本是非法的，无效的，根本不能承认其存在。对此，日本方面的态度是，此条约在国会上得

到通过，无法再倒回过去说其无效。

吃完早饭，我问大平外相，“你将以什么样的心情访问中国？”他沉默片刻，这样回答道，

“我们这是越后的山人野夫和赞岐的山人野夫出山（译注：田中是日本新泻县人，古代称为越后。大平是日本香川县人，古代称为赞岐。新泻县和香川县均多山）。不要小花招，以如实的态度进行谈判。”

在他平淡的言辞和表情后面，我感到了他的诚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

“这样就说定了！”我说了一句。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八月下旬，我经由香港到达北京赴任。

1966 年秋天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六年过去了。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一年，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红卫兵搞得北京混乱不堪。对内正在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对外则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进行严峻挑战。引用长征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出“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策略的林彪将军，是那个时代大歌特歌的人物。

六年后，文革进行到了后期阶段，国内的阶级斗争还在暗地进行，但发生了两个很大的变化。

一个是，虽然一方面跟苏联领导人的对立还在不断加深，但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尼克松的访华，而有了很大的转机。另一个是，企图篡夺国家主席位子的野心被识破的林彪将军，军事政变计划遭到失败，在乘军用飞机逃亡苏联的途中机毁人亡。据说，他对中国开展的对美战略持反对态度。

总之，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改善关系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来说，也成了最大的课题。挂在北京街头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幅标语，鲜艳夺目，如实反映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日中之间，就恢复邦交正常化，进行着紧张而繁忙的谈判。但是，在我心中，大平外相说的那些话成了一种不变的东西，我以此为指针，进行我的采访活动。

在北京亲眼目睹日中邦交正常化

日本首相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大地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是 1972 年 9 月 25 日上午 11 点 30 分（日本时间上午 12 点 30 分）。带着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目的，以田中首相、

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组成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约五十人左右一行，乘坐日本航空专机，到达了秋高气爽是北京机场。

超越漫长的断绝时代

田中首相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数次、郑重的握手。这是两国领导人超越漫长的断绝时代，开拓友好新时代的紧紧的握手。

接着，田中首相分别与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进行了握手。在周总理的陪同下，首相站到了肃然排列的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前面。乐队互奏两国国歌。在机场的主厅里挂着“太阳旗”和“五星红旗”，日本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脸上显出庄严的神情。

田中首相和周总理并排走在一起，开始检阅仪仗队。在长长的仪仗队的尽头，以冈崎嘉平太为首的一些正在北京的日本人站在那儿等候。田中首相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向他们伸出了手。一字形紧闭的嘴唇第一次张开，露出了笑容。

检阅完毕后，田中首相与周总理、大平外相与姬鹏飞外交部长分别乘坐两辆车，驶向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休息片刻后，首相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了周总理及中国方面的要人。下午两点 50 分开始，举行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轮首脑会谈。

不给予掌声

当天晚上 6 点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由周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在巨大的宴会厅里，响起了“佐渡曲”和“金比罗船”等曲子的旋律。田中首相面带微笑，大平外相也是笑眯了眼。这曲子可是越后和赞岐“故乡的旋律”啊。中国方面绝妙高超的表演把日中恢复邦交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首先，周总理致欢迎词。周总理时而语气柔和，重要的地方铿锵有力。当讲到“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的地方，两国出席者都静静地认真听着。

“在两国的历史上，我们有两千年的友好往来，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半个世纪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受了很大痛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教训。”

接着，周总理谈了今后中国方面谈判的态度。

“首相阁下在访华前就讲过，希望两国会谈能达成协议，而且一定要达成协议。我坚信，只要双方努力，充分交换意见，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一定会实现。”

周总理欢迎词的每一段落，出席者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干杯”以后，田中首相讲话。他对过去几十年间里，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进行了反省，并决心“借这次访问中国之际，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田中首相讲话的每一段落，中国方面也予以掌声，但讲到“添了麻烦”的地方，却无掌声。

一瞬间心猛地一紧。一定是周总理用“灾难”来表示的地方却被轻描淡写地说成“麻烦”，使他们无法接受，引起了不满的表示。

总体来说，第一天晚上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会面是得体的。但欢迎宴会也让人看到了要达到真正的握手，还有很多很多必须翻越的高山峻岭。

全力以赴紧张地进行讨论

第二天 26 日的谈判是：首先是上午第一轮外相会谈，接着下午进行第二轮首脑会谈，傍晚是第二轮外相会谈，会谈在全力以赴，紧张地进行。在这一系列的会谈中，就“战争的终结”，“台湾问题处理”也交换了意见。双方提出自己的联合声明草案，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集中讨论，而且还进行了对联合声明进行整理的阶段。当天晚上事务方面的工作是彻夜通宵。

这天，在第二轮首脑会谈前，田中首相在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个小时随行记者招待会。在第一轮首脑会谈前的那种紧张的表情，一点也没有了，一付毫无拘束的样子。当问及首脑会谈的内容时，他很干脆地就避开了，但他还是言外透露了，在第一轮会谈时，围绕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问题是会谈的主题，而且会谈的结果也决不是令人悲观。当问及交涉对方周总理时，首相走到隔壁的办公室，用毛笔写下了大意为“身如杨柳柔和，心似盘石坚强。”的字句，意味深长地说，“他是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位铁腕政治家。”

27 日上午，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游览了八达岭的万里长城和十三陵。下午从 4 点开始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第三轮首脑会谈。日本方面出席的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及外务省中国科科长桥本。中国方面出席的是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廖承志外交部顾问（兼中日友协会长），及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双方出席的都是这次谈判的最高层次官员。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在第三轮首脑会谈时定下三稿，最终的底稿作成由双方外相会谈时讨论。

“架吵完了吗？”

当天晚上 8 点，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田中首相下榻的国宾馆。说是毛泽东主席要会见他们。会见是从当天晚上 8 点半开始，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斋里进行的，会见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日本方面的大平外相及二阶堂官房长官，中国方面的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及

外交部顾问廖承志陪同出席了会见。田中首相和毛主席的会见得以实现，也说明了邦交正常化已基本上是决定了。

据二阶堂官房长官说，会见避开了政治方面的话题，谈到过去的中国、四书五经、菜肴话题等，始终是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二阶堂官长官透露的会见内容中，下面的对话曾成为话题：

毛主席：“架已经吵完了吗？不吵架可不行啊。”

田中首相：“跟周总理已圆满地进行了交谈。”

毛主席：“不打不相交嘛。”

这也显示了，围绕着“灾难”与“麻烦”，双方进行了对话，加深了日中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

在告辞时，毛主席把六卷《楚辞集注》赠送给了田中首相。听说这有三层意思：

第一是，借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楚辞》来赞扬田中首相为了日本人民的利益决然访问中国的那颗爱国之心。第二是，听说田中首相在访华期间还写汉诗，按照中国的习惯，对客人感兴趣的东西要有一种表示。

第三是，中国方面早已听说，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在访问日本时，曾问过田中首相，“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访问中国？”田中首相回答说，“因为日本和中国打交道要远远早于美国。”中国方面也是本着这样的心情，“说得不错，让我们把远自古代以来就有的深厚友谊再重新建立起来吧。”

求大同存小异

第二天 28 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整版报道了这次会见。大铅字的标题是：“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一小时认真友好的会谈。”北京市民看到后都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大家都为日中两国之间的“历史的瞬间”的即将到来感到高兴。

当时，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点是，常设在《人民日报》题字右侧的“毛主席语录”栏目里，登的是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和平五项原则”。另一点是，同时还登载了一篇社论，社论重新明确提出，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之际，在台湾问题上要坚持“基本原则”（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阴谋。）

日中首脑会谈在 28 日结束。在这一天进行的第四轮会谈实际时间只有 50 分钟左右，是最短的一次会谈。田中首相和周总理互相祝贺。

“马上就要实现邦交正常化了……”，周恩来说着，拿出用毛笔写的一幅条幅，“言必行，行必果。”田中首相也立即递上去用毛笔写的“信乃万事之源”的条幅。这是首脑外交的一个

交漆相容的一幕。

当天晚上，由日本方面主持举行了晚宴。在两位首脑的讲话中虽然都没直接提到“台湾问题，”但给人的印象是该谈的都谈了。跟我同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中国人表情都很开朗，大家都表示说，“在田中首相的讲话中，让人看到了很大的进步。”

接着，当周总理讲到“本着相互理解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我们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时，中国的外交官和报道界的有关人士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没问题了。”

大功告成的联合声明

日中邦交正常化在 29 日得以实现，建立了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从同日上午 10 点 20 分（日本时间同天上午 11 点 20 分）开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日本方面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中国方面的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交部长分别在声明上签字，随后两国政府立即进行了发表。联合声明由“前言”和“正文”的九个项目构成。

在前言部分里，首先谈到在恢复邦交谈判时，成为焦点的战争终结的问题，“战争状态的结束和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了两国人民的愿望。”坚持认为战争状态没有终止的中国方面与坚持主张“日中两国关系尽管不正常，但根据日台条约，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了”的日本方面，有着基本认识上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通过两国首相的相互谅解，根据政治上的判断得到了解决。接着，前言里提出了下列三点：

- ① 日本深刻反省在过去的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的责任；
- ② 日本再度确认对中国的复交三原则的充分理解；
- ③ 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树立和平友好关系，为亚州的紧张缓和与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全文共分九个项目，大意如下：

- ① 日中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从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
- ② 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③ 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对这一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
- ④ 两国决定自 1972 年 9 月 29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 ⑤ 中国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
- ⑥ 两国遵守和平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不诉诸武力来解决争端；
- ⑦ 两国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而且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行为；
- ⑧ 两国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 ⑨ 两国同意进行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的谈判。

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在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先

就日中联合声明的内容作了说明。然后宣布，“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宣告结束。”他明确表示，自9月29日起，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权间的外交关系实质上宣告终止。

在北京这四天所采访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即严肃认真又针锋相对。双方在一些重点上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认识。但之所以能克服这种不同，就是因为双方都迫切希望清算“不幸的过去”，实现“紧紧地握手。”

同时，还让人强烈感到日中之间还有一种“波长之差”。日本方面是“舍小异就大同”，而中国方面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不管怎么说，结果总还不错。但前途上还有很多要克服的难关在等待着。

难忘的“有勇气的提言”（附录）

要成就一件大事，必有“天时、地利、人和”在同时起作用。可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竹入笔记”的作用

首先是美国政府采取了对华政策的历史性大转换，实现了“尼克松访华。”同时，69年春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后中苏对立日益加深。在这种背景下，全面接受日本的访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作的战略性的决定。

这种划时代的动向由于是出于越过日本政府的头顶而发生的，即所谓的“尼克松打击”，给了自民党政权极大的冲击。但日本与中国在历史上就有着深厚的关系，在地理上又是“一衣带水”，大多数的日本人民对此是抱有好感，并表示欢迎的。

其结果是，一贯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对改善对华关系持消极态度的当时的佐藤荣作长期政权，就被迫早日下了台。后任的田中角荣首相很早就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最大的外交课题，而且得到了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广大在野党势力的合作。中国方面也为“超党派外交”助威，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在由形形色色的派别势力组成的自民党内部，反对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极力阻止田中内阁过早恢复日中邦交的势力也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促使田中首相作出最终决断的是“竹入笔记”。

“竹入笔记”记下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日中恢复邦交的两个月前对当时访问中国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所透露的，可以说是中国方面准备日中邦交正常化第一次日中联合声明草案的内容。其中即有“放弃对日本战争赔款要求，”以及予想会进展困难的“战争的终结”和

“台湾问题的处理”等有关方面中国政府的原则性立场，也有隐约可以看出考虑日本政府立场所作的柔软性的地方。日本的宣传媒介一致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竹入笔记”起了重要作用。从政治立场来看，事实也是如此。

池田大作的讲演

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那么信赖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会在执政党之前就把相当于决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内容”透露给他。要解开这个迷，笔者的见解是，事情的开端得追到1968年的秋天。这是在热闹喧哗的政治舞台的后面，在日本可以说是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报道的事实。借此机会，将此事记载如下。

如前所述，1968年是亚洲地区发生重大转机的一年。1月，英国政府宣布，到71年底撤去苏伊士平以东的英军。3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并表示不参加下届的总统竞选。5月，北越和美国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0月31日，约翰逊总统声明“全面停止对北越轰炸，”并同意南越解放战线参加巴黎的和平会谈。

“1968年是冲击极大的一年。美英两国已经不会再在东南亚火中取栗了吧。”从这一年的秋天起，笔者当了两年东南亚移动特派员，新加坡的拉家拉托南姆外相说的这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此背景下，东南亚诸国首脑开始注重与中国的关系，并寻求这个地区的整个“中立化”。

这一年，在日本也有人强有力地提言要从正面正视“中国问题。”这就是68年9月8日，创价学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第十一次创价学会学生部总会上作的讲演中提出的。

“中国问题，从我们的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上来看，也是一个必须触及的首要的根本问题。作为一个日本人，作为一名肩负未来的青年，我愿与诸君一起考虑这个问题。”（要旨）

面对两万名学生，池田会长这么开言道，并就日本应该采取的立场，提出了具体方案，即：

- ① 正式承认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存在；
- ② 让中国在联合国拥有正当的席位，并参加国际性的讨论；
- ③ 推进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他还提倡了这样的解决方案，即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时，应该做到两点。第一，日本政府在1950年与台北的国民党政权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完全是对中国七亿一千万人民（当时）的一种无视，对这一点，日本政府无论如何应与北京政府进行对话。第二，要做到这一点，两国首相及最高领导人应直接进行对话，确认基本的走向和平的意志，并从大局观和基本路线上加以巩固。

从那次讲演的内容中，可以明确看出有一个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正视中国问题的轮廓。现（顺序不同）整理如下：

- ① 日本自古以来就一直受中国文明（佛教，儒教等）的影响而发展至今；
- ② 日本挑起的战争的伤痕至今还没有消去。这种伤痕无论如何不能作为一种重荷而遗留给你们这些与战争无关的诸君；
- ③ 不解决这个中国问题，就不能说战后真的结束了；
- ④ 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单单是为了日本，也是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客观形势要求日本的使命；
- ⑤在日本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但我觉得，比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更接近民族主义，而且继承了东洋传统的精神主义；
- ⑤ 提倡日中友好的人，很容易被歪曲为“左倾”，这是一种浮浅的看法。我们是处在佛法的立场，以人性为根本，站在世界民族主义的次元上，祈求世界和平和日本的安泰。这在本质上即不是右也不是左。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确信公明党已进入了可以发挥具体意义作用的阶段。

日中恢复邦交和创价学会

令人瞩目的是，生前被称为日中关系评论“第一号人物”的竹内好（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看了池田的讲演文章后，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线曙光》的“感想文章”。竹内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以下两点给他感触很深。

第一点是，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是战前一代的责任，应该行动起来的那种非凡的决心。第二点是，恢复邦交的问题不是在国家一级上，而是在民族一级及民众一级上进行考虑。

竹内认为池田会长的讲演“超越了不同的信仰及不同的政治信条，完全能够共感。”并写道，“德不孤。仁者虽稀，但非天下皆无。”最后他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他的文章，“这儿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勇士。（中间省略）我看到了一线曙光。衷心祝愿成功。”

被池田这一提言深深打动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一生的悲愿，已八十七岁高龄还在鞠躬尽瘁的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老先生。他与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及日中友协会长廖承志有着深交，被称为是日中关系的“总联络人。”

松村老先生在去中国进行第五次访问前的70年3月底，拜会了池田会长，并请求说：“我一定请您跟周恩来总理会见。”对此，池田会长表示了谢意，但认为，“恢复邦交得靠政治才行”，并答应把这个重任托给公明党。松村也对此表示理解，说，“我想把公明党的情况、池田会长的情况全部都告诉给周总理。”

正因为有了这个过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71年3月才访问了中国。到日中邦交正

常化的两个月前的 72 年 7 月为止，组织了三次访华团。第三次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与竹入委员长会见了很长时间，并详细叙述了可以说是中国方面准备邦交正常化的相当于日中联合声明的第一次草案的内容。

竹入委员长把周恩来讲话的全部内容写了下来，带回日本，向已决心恢复日中邦交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作了全面汇报。据说看完“竹入笔记”后，田中首相松了一口气，说，“我明白了，竹入君。周总理真是通情达理的人啊。”

其实，周恩来总理在 60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创价学会的动向。据长年一直担当中国问题的创价学会副会长三津木俊幸介绍，最初向周总理介绍创价学会情况的是与松村老先生并列称为日中友好有功之臣的高崎达之助。据说听了介绍后，周总理对一直活跃在日中关系第一线上的孙平化，作了两个指示。一个是，预见将来北京和上海的交通堵塞，要研究日本包括立交桥在内的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另一个是，“从民众中组织起来的团体，占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创价学会，在推进日中友好方面不能无视”，要尽早与其接触。

据三津木介绍，担当这中间人角色的是作家有吉佐知子。她与池田会长有着深交，与中国方面的刘德有记者也是知己。65 年 7 月，以孙平化和青年部长秋谷荣之助（现任会长）为中心，双方各有三人出席，实现了中国方面与创价学会的第一次接触。

在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掘井人。池田会长继承了他们的意志，很早开始就进行了有组织的接触。这个出自他肺腑之言的“有勇气的提言”成了促使推动日中建交的巨大原动力，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这正如竹内好所写的一样，“超越了不同的信仰及不同的政治信条，完全能够共感。”

“绅士协定”

在有关日中关系的采访中，在一次非正式的情况下，从我的一位深交的朋友，创价学会最高干部之一的山崎尚见副会长那儿听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中国方面和创价学会开始接触后不久，通过某一位人士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给池田会长这样的口信：“在中国的传教希望先等一等。”对此，池田会长的回答是，“我心里有数。”

山崎副会长接着说“后来还有过这样的件事。”

那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 1974 年 5 月底，池田会长率领创价学会第一次访中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负责接待的当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对在欢迎宴会上坐在自己旁边的池田会长，带点幽默地说，“你在中国传教也没关系嘛。”池田会长一边笑着回答着“没有那个必要”，一边讲了下面的这一段话。

“现在，中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正在走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只要广大人民能从中得到幸福，那也是合乎佛法的。”

就这样，周总理与池田会长的“绅士协定”到今天还一直被遵守着。

这是一首唤起尽管肩负着不同的历史和现实，但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共鸣的插曲。